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

〔美〕爱因斯坦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

〔美〕爱因斯坦 著

许良英 赵中立 张宣三 编译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因斯坦文集.(全三卷)/(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A.)著;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7166-6

I.①爱… II.①爱…②许… III.①爱因斯坦,A.(1879～1955)—文集 IV.①N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71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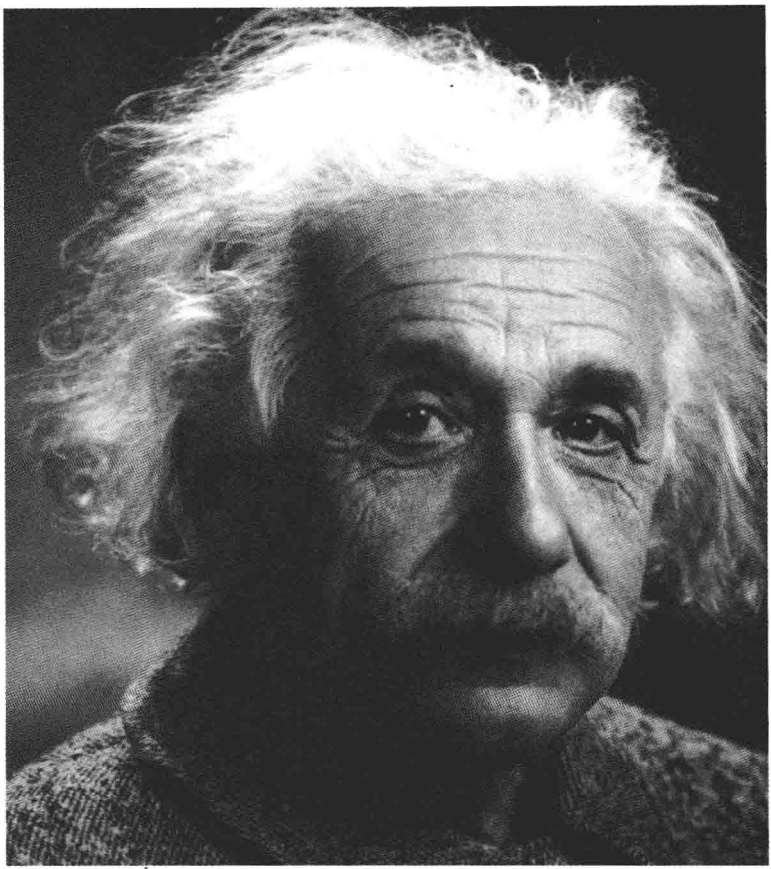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爱因斯坦文集
(全三卷)
〔美〕爱因斯坦 著
许良英 范岱年 赵中立
李宝恒 张宣三 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166-6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6$\frac{3}{8}$ 插页 3

定价:134.00元



阿·爱因斯坦(1947 年)

Der dunkle Ihnen für Ihre Aufklärungen. Mit dem neueste fehlt meinte ich die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Physik. —

Das Problem, vor welches auch die Intelligenz dieses Landes gestellt sieht, ist ein sehr ernstes. Es ist den reaktionären Politikern dieses Landes gelungen, durch Vorspiegelung einer äusseren Gefahr das Publikum gegen die intellektuellen Bemühungen misstrauisch zu machen. Auf der Basis dieses Erfolges sind sie daran, die freie Lehre zu unterdrücken und die nicht Gefügsamen aus allen Stellungen zu verdrängen, d. h. zu ~~ermorden~~ gleichzuschalten.

Was soll die Minderheit der Intellektuellen ihnen gegen das Übel? Den nicht offen bestehenden nur den revolutionären Weg der Non-cooperation wie Gandhi's. Jeder Intellektuelle, der von einem der ernste Vorladen wird, müsste jede Aussage verweigern, d. h. streik sein, sich einsperren und wirtschaftlich ruinieren zu lassen. Kurz, seine persönlichen Interessen den kulturellen Interessen des Landes zu opfern.

Wenn genügend Personen fänden, die diesen harten Weg zu gehen bereit sind, wird ihnen Erfolg beschieden sein. Wenn nicht, dann verdienen die Intellektuellen dieses Landes nichts Besseres als die Sklaverei, die ihnen zugedacht ist.

Dieser Vorschlag dürfte aber nicht gegen die bekannten Risiken der möglichen Selbstzerfleischung wenden darauf, dass es eines anständigen Menschen unwürdig ist, sich solcher Inquisition zu unterziehen, und dass diese Art der Inquisition gegen den Geist der Verfassung verstosse.

A. Einstein

P. S. Diesen Brief ~~darf~~ ist nicht als „vertraulich" zu behandeln.

爱因斯坦 1953 年 5 月 16 日给 W. 弗劳恩格拉斯信的手稿(见本书 36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卷选编说明

这一卷选编的内容主要是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反映他的一般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科学观、经济观、教育观、道德观和宗教观，以及他对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解，共164篇。此外，还有第一卷的两个补遗，共79篇，其中有爱因斯坦给M.贝索的信58封。最后是两个附录：《爱因斯坦生平和历史背景年表(1879—1955)》；《爱因斯坦著作目录》(共809题)。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在对本卷所涉及的爱因斯坦的主要政治表现和有代表性的社会政治言论作一简单介绍。

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人。他先后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旋涡中心的德国和美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深刻体会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要负怎样的责任。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萦怀于心的是希望科学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他向学技术科学的青年指出："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①]他认

① 1931年2月16日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见本书88页。

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①]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②]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中,榜样的作用是重要的,而他自己就感到有责任做出榜样。因此,对他所经历的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会“觉得是在犯同谋罪”[③]。

这突出地表现在1933年他同猖獗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斗争上。当时他的挚友冯·劳厄为他担心,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以明哲保身为好。他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④]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历史性贡献的人,对待社会政治问题又如此严肃、热情,历史上没有先例。一个人,如果他对人类历史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诚挚的责任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也就不可能有这样鲜明的立场。

* * *

爱因斯坦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但他却目睹了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因此,他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的首要问题,他一生中发表得最多的也是这方面的言

① 1949年《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见本书311页。
② 《人的真正价值》,见本书48页。
③ 1953年《人权》,见本书370页。
④ 1933年5月26日给劳厄的信,见本书133页。

论。1960 年出版的，由他的遗嘱执行人 O. 那坦和 H. 诺尔登编辑的文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就有相当于中文将近一百万字的篇幅。他对政治问题第一次的公开表态，是 1914 年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这次战争，列宁称为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科学家纷纷为他们各自的“祖国”效忠。战争一开始，德国就有九十三个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名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爱因斯坦则针锋相对地站出来公开反对这次战争，在包括他本人在内仅有四个人支持的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上签了名，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①。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德国地下的反战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受到了各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一小撮形形色色的政治小丑的恶毒攻击。1920 年国际联盟成立，特别是 1928 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总理白里安缔结的以“放弃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为标榜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给了他极大的希望。这段时间，他到处作演讲，发表文章，呼吁反对一切战争，宣传全面裁军，号召各国青年拒服兵役，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主持正义与和平、保证永无战争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但这些希望一个接着一个破灭了，而成为现实的却是 1931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对它的纵容和支持。紧接着是意大利并吞埃塞俄比亚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法西斯逆流到处泛滥，整个世界都受着侵略战争的威胁。

① 见本书 3 页。

1933 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纳粹篡夺政权后，在国内实行恐怖的全面专政，对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迫害，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幸而当时他在国外讲学，未遭毒手。纳粹对内的法西斯暴行和对外的战争叫嚣，使一向讲人道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宽容、反对仇恨，鼓吹绝对的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爱因斯坦，终于完全改变了态度，挺身而出，同这帮吃人的野兽进行殊死斗争。1933 年 7 月 20 日他写给法国青年 A. 纳翁的信[①]就表明这一转变。

出于对法西斯的高度仇恨，他对 1936—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非常关怀，深切同情西班牙的民主政府。1938 年的慕尼黑会议，他表示极为不满。1938 年 10 月 10 日给 M. 贝索的信[②]中对绥靖主义头子张伯伦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1939 年在获悉铀核分裂和链式核反应的发现以后，了解到德国正在积极从事原子能的研究，他在 L. 西拉德的帮助下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③]，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以免纳粹占先，会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

1945 年 5 月德国无条件投降。为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造成 25 万人死亡。这给了他意外的打击，特别由于他是原子能基本原理的发现者和制造原子弹的创议者，在美国他竟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使他感到无限痛苦和矛盾。战争结束后三个月，他就愤慨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

① 见本书 137 页。
② 见本书 190 页。
③ 见本书 210 页。

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①

由于意识到核战争（当时称为“原子战争”）对整个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怎样才能防止核战争？怎样才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证各国的安全和独立，以利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呢？这就是他战后最关心的大问题。他领导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刊《原子科学家公报》，要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严厉警告一切企图以核讹诈来玩火的野心家。他曾寄希望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建议把联合国大会改组成为他多年来所想望的世界政府。② 这个建议竟被苏联科学家斥责为支持“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最凶恶敌人的阴谋和野心”。

战争一结束，战时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就瓦解了。世界分成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双方开始了彼此敌意的对峙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所谓冷战。在这种局面下，斗争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中。在苏联，战前那种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的态势立即恢复，而且变本加厉。在美国，出现了恐苏、恐共歇斯底里，大批知识分子被怀疑对美国不“忠诚”而受到迫害。这股反民主逆流，经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Joe McCarthy）这样一个以谎言为生的政治小丑的疯狂作祟，气势更是猖獗。面对这股动摇美国精神基础的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爱因斯坦号召美国知识分子奋起抗击。1953 年 5 月，在给一位受到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侦讯的教师的信中，他激昂慷慨地呼吁：“每

① 见本书 240 页。

② 1947 年 9 月给联合国大会的信，见本书 277 页。

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总之，他必须为他的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幸福。”“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当得到的，绝不会比那种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好多少。”[①]这封气壮山河的信在报上公开发表后，在美国引发了一场保卫人权、保卫美国宪法的运动。一年后，政治小丑麦卡锡遭到参议院弹劾，成了历史垃圾。

爱因斯坦晚年对美国正在恶化的政治局势极为不满，在他逝世前五个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②]在他逝世前十多天，美国有个法西斯组织在刊物上大骂爱因斯坦是“颠覆分子”。爱因斯坦对所有这类加到他头上的打击毫无畏惧，一概采取横眉冷对的态度。

1953 年 12 月，美国有个律师组织准备授予他人权奖，他回信说，他在人权问题上“没有经过系统努力”，“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一个正直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如果对暴政和政治迫害默不作声，会感到内疚和自责；爱因斯坦不仅如此，还会觉得自己成了帮凶，犯了同谋罪。在社会正义问题上，对自己要求如此之高，在科学家中未有第

① 1953 年 5 月 16 日给 W. 弗劳恩格拉斯的信，见本书 365 页。

② 1954 年 11 月答《记者》杂志问，见本书 37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人，即使在人类历史中也是罕见的。

* * *

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在1918年11月13日对柏林大学学生的讲话中就清晰表明："我们的共同目的是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应当提防不让左翼的新的暴政来代替右翼的旧的暴政。"

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他在1931年11月的《主权的限制》一文有精辟的论述："国家是为人民而建立，而人民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全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①]他反对偶像崇拜，厌恶阿谀奉承，对他自己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而感到十分不安。他认为，"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②] 他犀利地揭露了当时在德国泛滥成灾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的盲目性，说这种人"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

① 1930年《我的世界观》，见本书55页。

② 同上。

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①] 他还提出一条历史规律：“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这一规律可与 1887 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交相辉映。

爱因斯坦常说自己有很深的宗教感情，人们往往就以为他已沦为神学的俘虏。这显然是一种误会。他对宗教的发展进行过历史的分析，认为宗教经历过三个阶段：恐怖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②] 他对前两者都持否定态度，而只肯定“宇宙宗教”。什么叫“宇宙宗教”？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已讲得很清楚：“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的感情。”[③]就是说他所“信仰”的，是自然界的规律性和可知性，而不是拟人化的上帝。他还进一步指出：“主张有一个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教义”，“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因为一种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只能在黑暗中〔指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站得住脚的教义……对人类进步有着数不清的害处。[④]”显然，他所说的“宗

① 1930 年《我的世界观》，见本书 55 页。

② 1930 年 11 月 9 日《宗教和科学》，见本文集第一卷，403 页。

③ 《关于科学的真理》，见本文集第一卷，364 页。

④ 1940 年 9 月《科学和宗教》，见本书 215 页。

教”，是指的“斯宾诺莎哲学中最清楚表示出来的一种感情的和心理的态度”；所以要沿用“宗教”这个词，只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示〔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①

爱因斯坦以虔诚深挚的热情追求真理，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人，特别是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因此，关于教育问题，他也发表过不少独特的精辟见解。1936 年的讲话《论教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的能够“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②。每个学生对人类共同创造的科学文化遗产，都应当“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你们的孩子们”，这样，“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③。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

① 1951 年 1 月 1 日给 M. 索洛文的信，见本文集第一卷，702 页。

② 1936 年 10 月 15 日《论教育》，见本书 169 页。

③ 《教师与学生——对一群儿童的讲话》，见本书 60 页。

他一定会更好适应进步和变化。”[①]他由自己青年时代的切身体会，对当时窒息人的学校教育和教学方法深为不满。他十分赞赏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法拉第的创新精神，说，“对于我们，法拉第的一些观念，可以说是同我们母亲的奶一道吮吸来的，它们的伟大和大胆是难以估量的”。[②] 他认为，法拉第所以能够发现电磁感应定律，提出“场”的概念，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因循守旧的“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背上传统的思想包袱”[③]。

爱因斯坦一贯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同情和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为争取独立和民族平等的正义斗争。在美国，他尽力支援黑人的解放斗争。在德国，作为一个受虐待、被屠杀的犹太民族的成员，他为自己民族争得生存权利而奔走呼吁。但是，他又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说过：“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在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④]

* * *

① 1936 年《论教育》，见本书 169 页。

② 1940 年 5 月 15 日《关于理论物理学的基础的考查》，见本文集第一卷，527 页。

③ 1950 年 4 月《关于广义引力论》，见本文集第一卷，671 页。

④ 1938 年 4 月 17 日《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见本书 179 页。

爱因斯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的名字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熟悉的，并且是亲切的。我们不会忘记，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向全世界各国呼吁，要用联合的经济抵制的办法来制止日本对华军事侵略。也不会忘记 1932 年陈独秀被捕，1936 年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他联合英美知识界知名人士所作的正义声援。他一生中，虽然只是在去日本讲学途中于 1922 年 11 月 14 日和 1922 年 12 月 31 日—1923 年 1 月 2 日来回路过中国，在上海停留三天，但这三天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写着：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可是他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已开始觉醒，说在上海所见到的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使得近年来中国的革命事件（显然是指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勤劳的，在奴役下呻吟的，但却是顽强的民族。[①] 作为一个外国科学家，在中国仅有的三天逗留中，对水深火热中的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竟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只有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朋友才有可能。

* * *

《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这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稿，从开始编译到今天，度过十六个寒暑，历尽坎坷困顿；它的出版，是同“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进行一系列斗争的结果。由于

① 见本书 30 页。

爱因斯坦的光辉形象在我国科学界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了林彪和“四人帮”推行愚民政策、实现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巨大障碍，于是他们南北呼应，效法希特勒当年的故伎，从1969年开始合伙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围剿爱因斯坦的恶浪。他们先后抛出两批所谓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黑文，极尽其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之能事。“四人帮”那个控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余党趁机强行霸占并无耻剽窃我们1966年以前编译的和写作的有关爱因斯坦的全部稿件。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最后在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正义支持下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申诉，译稿终于获得了出版的可能。可是，一部17万字的著作稿《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却至今下落不明。

在“四人帮”覆灭后举国一致开始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新的长征，这个文集得以公开出版之际，回顾以往那段辛酸艰险的历程，我们不禁深切怀念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深切怀念为我国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竺可桢先生；并且对所有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热情支持过这项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周培源先生、王淦昌先生、秦力生同志、李晨同志、邹国兴同志、何成钧同志、解俊民同志，以及其他在北京、浙江、上海等地许多热心的同志，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有关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编 译 者

1978年3月于北京

2007年7月修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